

20世纪50年代中央治理 西藏的伟大实践

——从执行“十七条协议”到实行民主改革

张云

20世纪50年代中央经营和治理西藏经历了十分艰难和曲折的过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总结出一套极为珍贵的治理经验。作者从正确运用理论和方法、坚持根本原则、重视制定工作方针、讲究策略等方面考察其内涵和突出特点，探寻变革时期西藏地方历史发展规律和治理风格，既在于探索当代西藏历史发展之幽微，又期望能为当代西藏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中央 西藏 治理 实践

作者张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地址：北京市北四环中路131号，邮编100101。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西藏地方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为落实“十七条协议”的规定，中央政府从西藏具体实际出发，准确研判形势，深入开展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应对各种难题和挑战：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建立西藏军区，驻守边疆，巩固国防；经济上，驻藏人民解放军开展大生产、打通与印度和尼泊尔间的贸易通道以获得补给，加快内地到西藏的川藏和青藏公路建设，从根本上解决进藏人员的物资保障问题；组织上，成立西藏工委保证统一领导；政治上，既慎重稳进，又大胆作为，既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又积极同极右反动势力展开坚决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而使这一时期成为西藏地方历史上颇为光彩夺目的一页，对于西藏治理而言，也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下面依据文献，将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进行归纳总结，以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

一、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

1. 辩证法的运用

辩证法是关于对立统一、斗争和运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哲学学说。在制定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时，毛泽东和中央主要领导很好地运用了辩证法，善于辩证分析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矛盾转化的规律，把西藏地方出现的任何一个尖锐挑战都转化为突破和拓展的机遇，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1956年12月，当中央面对西藏地方上层反对改革乃至不惜发动武装叛乱的情况下，采取了六年不改的收缩政策。与此同时，毛泽

东明确指出：“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① 达赖及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失败外逃后，1959 年 4 月毛泽东在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西藏的一些上层分子心在外国，不在中国。我们放慢改革，原来讲 1962 年以后再商量改革问题。现在他们打了炮，就把改革提前了四年。因此，打炮也是好事。”^② 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趋利避害，创造性地推动西藏社会的变革和治理，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中央西藏政策的一大特点。当时从以做上层的统战工作为重点，到民主改革发动群众，依靠翻身的百万农奴和爱国知识分子来改造西藏社会的变化，即是在艰难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实践中取得的，奠定了共产党在西藏执政的社会基础。

2. 底线思维方法

在西藏各方面工作基础都缺乏的条件下如何开展工作，应对复杂挑战，毛泽东和中央主要领导运用底线思维处理问题，就是从最坏处做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危机。事实证明，有了这样的思想和工作准备，就能够迎难而上，取得胜利。1952 年 4 月，在应对伪“人民会议”图谋策划的武装叛乱时，中央命令西藏工委“为了完成军事准备及利于持久，你们要加紧储粮集弹，筑工事，此外油盐及柴火也要储集，至要至要”。^③ 1956 年达赖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诞辰 2500 周年纪念活动，受到反动势力的拉拢引诱。对此，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 年 11 月 15 日）中指出：“要估计到达赖喇嘛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他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有人担心达赖跑出去了会泄露国家机密，毛泽东认为：“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就办坏了。”^④ 有了这样的底线思维，就保持了应有的定力和战略上的主动，得以从容判断和驾驭局势，镇定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并制定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3. 占据道义制高点

对于西藏上层极右势力的挑衅，毛泽东和中央常常以宽大的胸襟予以应对，并不看重先发制人，或者除恶务尽，即使对于因反对“十七条协议”、制造拉萨骚乱而受到过严肃处理的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也是如此。1955 年 3 月 8 日毛泽东在同达赖的谈话中再次提到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4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184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69—70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152 页；《中央关于达赖、班禅出国问题的指示（节录）》（1956 年 11 月 17 日），《平息西藏叛乱》，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1 页：“要设想到，他们出国以后一时不愿返回西藏是有可能的；反革命分子趁他们出国的机会进行破坏甚至掀起叛乱也是有可能的。对此，你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有应对恶劣情况到来的充分准备。”

他们,甚至还考虑给他们安排职务。他问达赖:“两个司曹现在怎样?在(自治区)筹委会能不能将他们放进去,或者将来在全国政协委员会安排一个位置。开会时他们愿意来,我们欢迎,不愿意就算了。总之,我们不能忘记他们。”^①在处理达赖叛逃问题上,同样如此:“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样呀?要变的……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②也就是说,不争一时而争长远,留有余地,旨在影响群众,占据舆论和道德制高点。

4. 商量着办事

在西藏政策的制定和落实过程中,中央十分重视与西藏地方上层在不同层面和以不同方式充分协商,毛泽东强调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能够办好事、办成事的关键之一。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关于“十七条协议”的落实,以及自治区筹委会的建立、民主改革的实施等,都是通过大量的反复协商来实现的,而涉及西藏的所有重大政策和决定也都是在协商中产生的,并在协商中得以贯彻执行的。协商的过程就是政策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落实的过程,协商减少了阻力,化解了许多尖锐的对立和矛盾。中央也要求达赖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的堪布会议厅之间关系的改善,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毛泽东给达赖、班禅写信和交谈,既是开导教育的过程,也是征询建议和协商的过程,对制定重大方针具有重要作用。

二、坚持根本原则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落实的工作遇到重重阻碍,中央在处理这些复杂问题中,始终坚持一些根本原则,并作为坚定不移的工作目标。

1. 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样的重大是非问题上,不管外来的压力有多大,毛泽东观点十分明确而坚定,没有丝毫动摇和妥协余地。1950年10月21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 1895—1963)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递交了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双方进行了交谈。潘尼迦劝诫说,在联合国有可能准许中国加入的时候,在西藏不会有任何强力反抗的情况下,中国在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值得的。章汉夫指出,中国参加联合国和中国解放西藏是两个问题。西藏是一定要解放的。我们希望西藏能以和平方式解决。毛泽东在这份谈话记录上批示:“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简单地答复。”^③同月26日,中国驻印度大使申健应约与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V. K.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79—18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01页。

Krishna Menon) 谈话中,除了指出印度照会将中国军队进入中国自己的领土西藏用作“侵略”的错谬之处外,还告知印方:中国政府始终愿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并不等于说中国军队不能进入西藏。28日,毛泽东对此的批示是:“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①这些清晰展现出毛泽东处理这一问题的鲜明原则立场,不给外界留下任何幻想空间和讨价还价的余地。

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为了完成驱除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这个首要任务,1951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班禅的电报中指出:“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与达赖喇嘛紧密团结,为彻底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②在1952年5月19日有关上层统战工作的指示中,中央明确指出,当时包括对三大寺在内的西藏工作的重点是上层,“任何上层分子,只要他不是顽固的帝国主义走狗或蒋匪帮特务,我们都应争取……帝国主义正在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我们争夺西藏的上层分子,我们必须积极地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使帝国主义的阴谋归于失败”。^③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时说:“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④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对帝国主义势力是当时西藏工作中的头等大事和最为重要的任务。

2. 维护民族团结

中央在对和平解放前后一个时期西藏局势的判断中,认为西藏存在着诸多突出问题,其中就包括汉藏民族之间和藏族内部不团结的问题。毛泽东在《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宴会上的讲话》(1951年5月24日)开头就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⑤

要解决汉藏民族团结的问题,中央也在党内首先提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195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特别强调要批判大汉族主义,认为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必须深刻批判我们党内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即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着满腔热情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34—3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5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80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01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48页。

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观花的访问”。^①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中央在西藏工作中不仅重视汉藏民族之间的团结，同时也极为重视西藏藏族内部的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1953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给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复信中说：“你回藏后，努力为汉藏两族之间的团结及西藏内部的团结做了许多工作，并为当地僧俗人民的利益做了工作，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爱国和团结的基础上，相信我们的友谊会与日俱增地巩固和发展起来。”^②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特别强调了汉藏团结问题，他指出，中国的民族团结只能建立在消灭剥削和压迫，驱除帝国主义势力之上，是实现民族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今天汉族和藏族的团结和全国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一样，是反帝爱国的团结”。^③也就是说，只要反帝爱国就是团结的对象。

3. 推动社会制度的改革与进步

《中共中央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收缩方针的指示》中指出：“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迟早一定要实行的。西藏人民必须经过民主改革，才能获得政治的和经济的解放，造成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和平的，而且必须得到西藏地方上层和下层的同意。“我们主张的民主改革，不管采取多么和平的方式，都不能不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因为它的目的是要把农奴制的西藏改变为人民民主的西藏。”^④因此这一过程既是长期的，又需要做艰苦的工作，但是基本立场却是坚定的。

4.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制约西藏地方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内在因素是腐朽、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阶级路线，是依靠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农奴制度”，使百万农奴翻身解放，获得人身自由与权利，成为建设新西藏的主力军。“在民主改革中，要成立农民协会或者农牧民协会，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的领导权应当掌握在贫苦农民手里，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⑤让世代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农牧民群众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当家作主，成为社会的主人，是坚持不变的一项原则。

5.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在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也是中央西藏工作的根本原则之一。1952年10月16日，周恩来在招待西藏致敬团及各地区民族代表的致辞中表示，要“认真普遍地推行民族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100—10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9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129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197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203—206页。

区域自治政策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制度，认真普遍地保障散居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更有计划地大量培养与本民族人民有联系的民族干部，更有效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卫生、教育及其他经济文化事业，更加注意教育广大人民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① 同年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对西藏工委培养民族干部五年计划的指示》针对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问题指出：“一般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干部的对象大体有三种人，即爱国知识分子，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与人民有联系的中上层领袖人物。在西藏地区，目前将以僧俗爱国知识分子和在人民中有影响的中上层人物为主。”^② 1954 年 9 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世班禅从西藏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常务委员、政协副主席。1956 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1965 年 9 月西藏自治区成立，开启了西藏地区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三、重视制定工作方针

由于西藏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极端重要性，中央始终把西藏工作放在特殊的位置来对待，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针，保证了正确的方向，避免了大的波折和失误。

1. 中央决策西藏事务

1952 年 4 月 8 日，中共中央在给西南局和西藏工委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同意西南局意见，拉萨骚乱事件由中央直接处理。中央并决定嗣后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报告，同时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提出……最近在拉萨创办小学一事没有报告和请示，是不对的。此外似乎还有一些事也未事先报告和请示。此点务请工委严格注意。必须认识到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③ 这是第一次严肃强调西藏事务由中央直接处理的问题。同年 5 月 19 日，中央对西藏工委“再一次指出，你们和西藏人相关的各项工作，每项均须事前报告中央，经过批准，然后执行”。^④ 后来由于西藏成立农牧部未向中央报告，12 月 29 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的批示中，第三次强调：“根据中央过去的规定，我党和军队一切与西藏人民和西藏政府有关的重要问题，都须报请中央处理，不归西南（局）处理。西藏工委和军区有些事并未遵守这一条规定。请引据规定原文给以再次指示。”^⑤ 中央如此不厌其烦地强调处理西藏重要问题的权力归中央，

^① 《周恩来在招待西藏致敬团及各地区民族代表宴会上的致词》，《人民日报》1952 年 10 月 17 日；《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9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 92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65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83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92 页。

是因为极为重视西藏问题,不希望出现任何方向性的或者政策性的错误,影响到西藏地方的稳定。

2. 颁布西藏工作指导方针

中共中央通过制定并颁布西藏工作方针的形式,明确西藏工作的原则,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以及具体的解决办法,而且大多都是由毛泽东本人亲自起草的。例如,1952年4月1日的《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问题的指示》主要分析了西藏的形势,提醒注意西藏地方过去曾长期与祖国内地对立,帝国主义尚未放弃侵略及在西藏挑起战争的阴谋;西藏地方的统治虽为人民所不满,毕竟还是西藏现时的政府,对待噶厦态度不妥当仍会招致人民的不满;在西藏地区的工作,既要坚持既定协议的执行,又要了解各种情况,从实际出发,经过许多必需的步骤和曲折,以达到稳步执行协议的目的;张经武、张国华等不宜出席噶厦会议,尤其不宜在他们的会议上形成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僵局;要多做准备,能稳操胜券才可以拿出主张;不宜提易被误解的向西藏什么地方“进军”之类话语等。^①1952年4月6日的《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针对西藏地方上层抵制落实“十七条协议”的问题,中央决定,首先是精打细算、发展生产、打通西藏与内地及印度之间的贸易关系,奠定物质基础,保证不因解放军进藏而影响到百姓的生活水平。其次对于改编藏军问题,中央认为反对者不仅是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位司曹,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因此,“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不如拖拖以待时机,更为有利。^②1952年4月13日的《中共中央对西藏工作的几点指示》,涉及到修改对两司曹反对成立西藏军分区、改编藏军的话语表述;提醒张经武在与达赖见面,在与阿沛等人员谈话时,暂时不要说有关妥协政策的话,不要轻易表示自己的具体意见,以免陷入被动;认定拉萨的藏军非改革不可,其他地区的藏军可以慢点改革。一步一步做,而不要一起做,并提出了具体改革办法。^③1961年4月21日的《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是内容最为丰富和完整的一个西藏工作文件,也是在民主改革之后出台最为重要的一个文件。文件中开宗明义表明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态度,认为,今后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彻底,让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经济得到发展,让翻了身的农牧群众确实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在这五年里对西藏的政策包括经济、财贸、社会改革、民族、对上层人士的团结改造政策、宗教政策等等,都一定要力求稳妥,都要防“左”、防急。需要做好的主要工作包括: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生活;经过普选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建立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对待宗教问题更要慎重,更加不能性急;配合对外斗争,保证西南边境和平稳定;肃清叛匪;挑选干部,培养干部,进行整风,发展和巩固党的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65—6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68—71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75—76页。

组织；各级党委和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不要此外兴章程，出点子。^① 反对自作主张，自行其是。

在颁布上述涉及西藏全面工作方针的同时，中央还颁布了一些涉及西藏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的具体工作方针政策，包括 1952 年 4 月 11 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反动分子的斗争实行有理有利有节方针的指示》，要求坚决而镇定地付诸实行。^② 1952 年 5 月 19 日《中共中央关于必须积极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指示》，突出强调此时期统战工作的重点是上层。^③ 1952 年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关于必须极端谨慎对待宗教问题等的四点指示》，其中第一点就是强调，在西藏地区佛教问题是各阶层深切关心的问题。“必须充分估计到佛教在西藏民族的悠久历史及其深入人民的传统影响，以及达赖、班禅在各阶层人民中享有的很高的佛教信仰，同时充分认识到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国际关系、在西藏地区怎样对待佛教问题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因此，你们必须坚决遵守和执行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宗教的政策，对纯属宗教范围内的事情，不要做任何行政的干涉。对其他问题的处理如牵连到宗教时，则必极端谨慎，力求做到在宗教问题上无所借口。”^④ 1952 年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对西藏工委培养民族干部五年计划的指示》，同意西藏工委开办长期和短期学校培养藏族干部的做法，并提出以僧俗爱国知识分子和有影响的上层人物为主的原则，在僧俗爱国中上层中有计划培养，在条件成熟的昌都、日喀则地区办短期政治训练班或学校，在卫生机关和贸易机关开办初级训练班等。^⑤ 1955 年 3 月 11 日《中共中央关于西藏金融贸易工作几项措施的批复》，回应了在青藏、川藏公路通车后西藏金融贸易中影响物价、牵涉与西藏地方官商利益关系的若干具体问题。^⑥ 1955 年 9 月 4 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西藏进行的改革属于什么性质问题的答复》，既指出了在西藏民族中进行的任何改革都是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部分，同时又指出由于西藏地区的特殊性，在一定时期还只能是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并需要更多时间和采取较特殊的方式进行。“在党和工人阶级政权的领导下，经过国家对西藏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更多的长期的援助，同时在西藏民族内部完成了民主改革、消灭了封建农奴制度的基础上，西藏民族可以通过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通过自己的道路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⑦ 这清晰明了地指出了西藏改革的性质、特点和方向。1956 年 9 月 4 日《中共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指示西藏工委民主改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 253—263 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 74 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 80—81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 89 页。

⑤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 92—93 页。

⑥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 138—140 页。

⑦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 141—143 页。

革必须是和平的，对上层一定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准备：一是反复协商，征得他们的真正同意，一是要在政治上和生活上把上层安排好，严格遵守“十七条协议”的规定，而不能失信。“从西藏当前的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以及昌都地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来看，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我们的准备工作也绝不是一两年内能够做好的。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要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应该说这是对西藏上层分子的一种让步。”慢一些、稳一些就会好一些，这并非消极等待，“从现在开始到进行改革这个期间，必须抓紧上层统一战线、培养藏族干部、发展党员和团员、扶助群众生产、尽可能地改善群众生活（包括减轻某些负担）和逐步使自治区政权民主化等项重要环节，努力作出成绩，以便为改革做好准备条件”。^① 195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收缩方针的指示》，指出“中央在重新考虑了西藏地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以后，决定从今年起至少六年以内，甚至在更长的时间以内，在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② 195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西藏平叛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由于噶厦撕毁协议，发动武装叛乱，中央提出我们现在的公开口号，只提平息叛乱，不提实行民主改革。“我们的方针是边打边改，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地区暂时缓改，拉萨地区可以首先进行改革，接着是山南、昌都和丁青等地，班禅地区应该放在后面进行，昌都由帕巴拉管辖的几个宗，如果不发生叛乱，也要放在后面”，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原则和具体措施。^③ 此外，1959年中共中央批复西藏工委关于收兑藏币办法的意见，包括：收兑比价五十两藏币折合人民币一元；收兑期限以不同地区规定不同期限；一律不收假币等。^④ 1961年4月对西藏工委《关于农村中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的批复，提出要稳定农民个体所有制，使农民安心发展生产；认真办好互助组，五年不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力开展爱国丰产运动，积极发展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按照常产征收爱国公粮，提倡节约粮食，存粮备荒；坚决保护农村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战线等。其中纠正了民主改革中出现的一些过于激进的问题。中央认为，现在制定这样一个文件很有必要，对于纠正和防止过急、过“左”的情绪是大有帮助的。^⑤ 1962年9月11日对西藏工委《关于目前当前若干具体政策规定（修正稿）》的批复中提出两个注意问题：一是在西藏所有牧区，都必须集中发展畜牧业，切实执行以牧为主的方针，不要提倡牧民开荒和农牧结合的口号；一是在五年不办合作社的情况下，要很好地注意实行牧工牧主两利和扶助贫苦牧民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未参叛的牧主、领主和领主代理人，坚持争取、团结和耐心教育的政策，只要求他们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182—18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19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203—206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237—238页。

⑤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264—271页。

帝、爱国和拥护党的领导。^① 由上可知，中央的专项指示包括了对反动分子的斗争方针，对上层的统战工作，如何处理宗教问题，民族干部培养，西藏金融贸易，西藏改革的性质，民主改革与收缩方针，藏币兑换，以及西藏农村和牧区的具体政策等等，囊括了当时中央经营和治理西藏中最重要的领域和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能够为推动西藏治理的健康进展起到关键的作用。

3. 慎重稳进与乘势而上

中央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西藏工作方针中，强调最多的应该是“慎重稳进”，无论是落实“十七条协议”改编藏军遇到阻力时，还是成立自治区筹委会遭到上层保守势力的抵制，乃至实行民主改革遭到反动集团的强烈反对时，中央都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一则提醒西藏工委要认真调查研究，防止脱离实际和群众的冒进行为；另一方面又多次对西藏地方上层保守势力采取让步政策。根本原因在于西藏工作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等均比较薄弱，不能只靠军事优势加以解决。1957 年 4 月，根据中央“六年不改革”的方针，西藏大批内撤进藏的军政人员，在藏汉族干部减少了 92%，驻藏部队减少了 70%，^② 是收缩和稳进的重要表现。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又是西藏地方社会变革最大的一个时期，这与中央收缩而不停止，让步而不退步，甚至能迂回前进、乘势而上的方针紧密相关。无论是 1951 年 9 月毛泽东指示“入藏部队当前的任务是生产与筑路并重”，还是 1959 年 1 月西藏上层叛乱即将发生时，毛泽东要求西藏工委争取群众、锻炼军队等，^③ 都是典型例证。慎重稳进并非无所作为，而是积极准备，蓄势待发，乘势而上，这正是稳进时期西藏工作取得巨大进步的原因所在。

4. 准确判断形势，切实执行决定

中央对西藏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有很强的针对性，语言简练而主旨鲜明，并且还有深入细致地分析和论证，让西藏工委不仅明白政策的原则要求，易于准确把握其内涵，而且能心领神会地切实执行各项方针和指示。1952 年 3 月拉萨发生伪“人民会议”制造的反对“十七条协议”的骚乱，中央认为：“不应看作只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作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他各条。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辈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而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他们选择在班禅尚未到达的时机举行这次示威，是经过考虑的。班禅到拉萨后，他们可能要大拉一把，使班禅加入他们的集团。”^④对反动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 281—282 页。

^② 参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 1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9 页。

^③ 参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 1 卷，第 54—55、164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63 页。

上层的手法,乃至心理活动分析得入木三分,从而能采取很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破解。这次骚乱也让中央下决心逐渐改编藏军,而且是从拉萨首先开始,“改革的步骤,是在阿沛等爱国派当政后,逐步撤换一些最反动的军官,而将其余的军官分批调出受训,逐步使藏军中有靠拢我们的军官,用这种办法逐步达到改编藏军的目的”。^①有原则立场,有具体对策,明了清晰。

四、讲究策略

有了好的工作方针,在执行中也还需要讲究策略,使政策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发挥应有作用。毛泽东和中央主要领导在运用策略方面可谓驾轻就熟、炉火纯青。

1. 以政治解决为优先原则处理各项复杂问题

在解放西藏的过程中,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战争对西藏地方的破坏,特别是对汉藏民族感情上的伤害,中央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始终把政治解决放在第一位。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开展各项工作,也始终把政治解决放在优先位置,有效地化解了诸多尖锐矛盾。1952年4月12日,毛泽东在给西藏工委的指示中强调:“目前你们只作政治斗争,对改编藏军、成立军分区、成立军政委员会等事根本不谈。否则可能被反动派认为我示弱。”^②中央还提醒西藏工委,“西藏贵族们是善于干政治斗争的,你们也要学会这一套”。^③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越是形势复杂的时候,越显示出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优越性,成功的政治工作是赢得主动、占领先机的关键环节。

2. 以达赖为重点做好达赖、班禅等上层的统战工作

1952年10月,中央同意西藏工委关于将达赖、班禅以及昌都解放委员会三个地区政权统一起来的意见,指出:“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西藏(指前藏、后藏和阿里地区,在条件成熟时还可包括昌都地区)地区的统一,对于建设和发展西藏,对于争取全国藏族都是有利的。”“在团结达赖和班禅,即力谋和平统一西藏内部时,一方面固然要估计到班禅方面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的进步性,并善于推进和运用这种进步性。但同时必须认识和估计到达赖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在西藏地区而且在整个西藏民族中都比班禅为高的事实。因此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和平统一西藏及和平解放西藏后我们在西藏地区的各种工作政策,都不能不以争取达赖集团为首要任务。”^④1954年达赖、班禅来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在发给各省的《关于接待达赖、班禅的招待、宣传方针》中指出:“中央的方针是在西藏地区逐步地实现统一的区域自治,在达赖第一、班禅第二,达赖为正、班禅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7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7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80页。

^④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第64页。

副的原则下，把达赖、班禅两方面的爱国力量和其他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① 1956 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建立，让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副主任委员。围绕这一宗旨，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位领导反复做工作，特别是毛泽东为此花费不少心血。根据不完全统计，从 1952 年 5 月 24 日到 1959 年 3 月 15 日，毛泽东给达赖的信和电报有 12 份之多，给班禅的信函和电报则有 9 份。毛泽东与到北京参加会议的达赖、班禅集体谈话一次，分别谈话一次。在达赖 1956 年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诞辰纪念活动期间，周恩来亲自到印度三次与其谈话，做工作。^② 1955 年 3 月毛泽东在会见达赖时甚至当面告诉他：“凡是派去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有和你们搞不来的、团结不好的，你告诉我，我们就调回来。”^③ 在 1956 年 8 月 18 日给达赖喇嘛的信中，再度强调：“我总是担心，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请你负起责来，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④ 可谓真诚备至，用心良苦。

3. 以做实事做好事为突破口开展群众工作

在谈到全面落实“十七条协议”条件还不成熟，不如往后拖延点时间的问题时，中央特别指出：对于噶厦保守派势力，“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落实协定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得小学不宜办，则小学也可以收场不办”。^⑤ 在面西藏地方上层即将发动的武装叛乱以及分析很快平息叛乱的原因时，毛泽东和中央首先提到的是争取群众和群众的支持，赢得群众的支持成为做好各项工作的有效途径。^⑥

4. 以西藏组团到内地参观为渠道化解民族间的隔阂

1952 年 8 月 7 日西藏组织派出了和平解放后第一个内地参观团，团长为欧希·土登桑却，副团长为门堆巴·洛桑旺堆，成员有 40 多人。^⑦ 同年 8 月 21 日西藏派出了以柳霞·土登塔巴为团长，丹巴日杰、丁甲·多吉坚赞为副团长的 12 人致敬团，经过印度、香港前往北京。10 月 8 日毛泽东接见了致敬团成员，并发表讲话，强调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不信教，信别的宗教一律保护；西藏人口需要发展，经济、文化也需要发展；共产党不仅

^①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 1 卷，第 76—77 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45—166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115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150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 70 页。

^⑥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 61—62、164 页。

^⑦ 参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 1 卷，第 60 页。

不会剥削压迫藏族,还要帮助西藏人民发展人口、经济与文化。^①同年3月3日西藏青年参观团一行62人前往北京,团长为索康·喀洛旺觉,副团长为噶雪·敢异、雪康·土登尼玛、桑巴等。^②1953年9月28日,以噶伦、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朵噶·彭措饶杰为团长,噶章·罗桑仁增、纳旺金巴为副团长的国庆观礼团抵达北京,10月18日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告诉代表团成员:中国各民族不论大小都要团结,民族地区的发展要商量着办,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③1954年8月5日,以噶伦索康·旺清格勒为团长的西藏国庆观礼团,以然巴·朗吉旺秋为团长的参观团先后离藏赴京,10月25日受到毛泽东的接见。^④1955年9月28日,以噶厦卸任噶伦拉鲁·次旺多吉为团长的西藏参观团和以桑颇·登增顿珠为团长的青年参观团到达北京。^⑤1956年8月27日,毛泽东接见了以唐麦·贡觉白姆为团长的西藏妇女参观团一行61人。^⑥通过这些不同界别的观礼团、参观团的到京参观,既增加了汉藏民族之间的了解和感情,也加强了两地人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这些参观团和致敬团的成员几乎都是西藏地方有影响的上层贵族,实地接触和感受让他们开阔了视野,增进了对内地的感性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祖国内地、对新中国的认同。

5. 以建立爱国群众团体为抓手打牢良好的社会基础

西藏地方由于民国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特别是1913年和1949年西藏上层部分分裂势力搞的驱除汉人事件,对西藏地方的民族构成,以及汉藏民族关系产生诸多消极影响,加之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几乎为空白,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在西藏地方保存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统治的条件下,如何扩大西藏地方的爱国进步力量是一个关系长远的问题。在做好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西藏工委在基层建立爱国群众团体,扩大共产党落实“十七条协议”以及在西藏实行改革进而执政的社会基础。1953年1月31日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成立,主任为达赖的哥哥洛桑三旦,副主任为江金·索南杰布、平措旺杰、梁枫、桑颇·登增顿珠、王沛生(回族)、噶雪·顿珠。^⑦1954年3月8日,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成立,主任委员为达赖的姐姐尧西·泽仁卓玛以及阿沛·才旦卓嘎、朵噶·晋美白珍等。^⑧1956年9月28日,西藏爱国青年联谊会成立,会长为洛桑三旦。10月26日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87—88页。

^② 参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第67页。

^③ 参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第69—70页。

^④ 参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第77页。

^⑤ 参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第86页。

^⑥ 参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第98页。

^⑦ 参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第66—67页。

^⑧ 参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第73页。

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成立，达赖、班禅被聘请为名誉会长，佛协分会长由甘丹赤巴·土登滚噶担任。11 月 22 日，西藏爱国妇女联谊会筹委会成立，尧西·泽仁卓玛为主任。^①可以看出，担任这些群众组织主任的都是西藏地方上层贵族，特别是达赖的亲属，做上层统战工作的用意十分明显。与此同时，也培养出一大批藏族干部。自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到 1958 年，已吸收和培养 6128 名藏族干部和学员，发展了 1190 名藏族党员、19344 名藏族团员，建立和发展了爱国青年、妇女的组织，从而为实行民主改革、建设西藏打下坚实的干部基础。

6. 打击极少数死硬分裂分子的分裂活动

1952 年 1 月 13 日，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召集西藏地方政府部分官员秘密集会，决定“采取武装行动，把解放军赶走”，随后又组织伪“人民会议”，在拉萨发动武装骚乱。3 月 31 日，伪“人民会议”以请愿为名，纠集万余人，包围张经武的住宅桑都仓，并在四周屋顶架起了机枪，他们疯狂叫嚷：“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社会制度不能改变！”对于如此嚣张的行为，中央命令西藏工委通过争取达赖和噶厦的同意将两人撤职并解散伪“人民会议”，^②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遏制了亲帝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也明确了底线，教育了群众。

20 世纪 50 年代中央对西藏的经营和治理，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极端复杂，从战争状态转到经营治理状态的巨大差异，以及西藏工作基础薄弱、经验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或多或少存在的过急、过“左”问题，改革在牧区过激问题，还包括改革后统战工作及西藏工委内部自身团结工作做得不够好的问题等。但是，这一时期无疑是中央对西藏的经营和治理中最成功的时期之一，不仅落实了“十七条协议”的主要内容，实现了西藏地方从封建农奴制社会到人民民主社会的伟大变革，成就是辉煌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工作和治理经验。中央决策、制定方针政策、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充分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和认真解决问题、紧密依靠群众、扎实开展统战工作、良好的协商机制、娴熟的策略运用等等，都成为西藏工作十分珍贵的经验，也是西藏工作摆脱忽“左”忽“右”、震荡反复的有效途径。同时，在这一时期由这一代人创造的“老西藏精神”，业已成为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不畏困难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铭记和发扬光大。

[本文责任编辑 刘清涛]

^①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 1 卷，第 100、102 页。

^② 《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致达赖喇嘛通知书》（1952 年 4 月 15 日），《平息西藏叛乱》，第 51—54 页。

CONTENTS

Speech at the Theory Seminar on Celebrat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Wang Weiguang (1)

Central Government's Great Practice in Administrating Tibet in 1950s: From the Execution of "Seventeen-Article Agreement" to Democratic Reform Zhang Yun (6)

In 1950s, central government went through a very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course in the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Tibet, and achieved splendid accomplishment and concluded very valued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 The author tries to explore the content and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central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on of Tibet in this period from aspects of the correct using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sticking to basic principle, thinking highly of making work guidelines, considering the art of strategy and policy, in order to seek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administrative features, hoping to probe details of Tibet's modern history, as well as to provide some benefit experience to contemporary administration of Tibet.

Key words: Central Government Tibet Administration Practice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China's Contemporary Border Policy in Tibet and Its Achievement Sun Hongnian (20)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entral government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special favorable policies to border area of Tibet, and the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in Tibet also made some accommodative policies. All these policies effectively defended national un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area and benefited people's lives. For the past 60 and more years, people of different ethnicities in the border area strived to develop economy and sustain border stability, giving their own contribution for building homeland and guarding southwest borderlan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China's contemporary border policies in Tibet and achievements from academic perspective.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a Border Area in Tibet Stability Development

A Historical Exploration of the Prepa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ibet Railway Zhang Yongpan (32)

Constructing Tibet railway had been a big hope of Chinese people for 100 years, and idea,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is railway went through 100 years from the Qing Dynasty,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wever, it was after the PRC's founding, especiall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and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at the railway construction was really put into pract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entral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on of Tibet, the survey and construction started. Several generations of leaders of the Party pai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ibet Railway. Into the new century, following the fast development to China's economy, it only took five years for China to build the Tibet railway. The construction of Tibet railway was related to administration of Tibet, national economic power,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borderland stability.

Key words: Tibet Tibet Railway Borderland Development

On the "Great Wall" in Northeast Region during Yan, Qin and Han Period Fan Enshi (44)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relics of fortress and barriers belonging to Yan, Qin and Han period